

# 也谈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问题

尹世杰

**摘要：**经济学是内容极其广泛、极其丰富而现实性又很强的重要学科，必须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不能采取单一的方法，如所谓“数学化”的方法。经济学必须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而以定性分析为主的方法，还要运用其他一些研究方法，如演绎法、归纳法、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综合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等。经济学研究还要开拓创新，勤奋钻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践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不断丰富经济学的内容。

**关键词：**数学化 多元化 经济学研究方法 开拓创新

最近看到曾国安同志的文章《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问题的思考》，提出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问题，反对那种“把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反对那些“认为没有数学的经济学就不是经济学”；“认为没有数学模型的经济理论是不成熟的，还不是真正的理论，而只是想法”；“数学水平的高低是经济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提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不能采取单一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宽泛……有些领域，则要么无法运用数学工具……”。有不少观点，我颇有同感。多年来，我对经济学“数学化”问题，也发表过一些意见，这里再提出一些看法，以供讨论。

## 一、从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作用谈起

我国自古以来，认为“经济”就是“经世济民”，并特别重视“民”（人民）的作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这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以人为本。这也就说明了：经济学应该是“经世济民”之学，应该是研究“人”的科学，应该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并实现“本固邦宁”的科学。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济学应该研究：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些重大问题。

这就说明，经济学是内容极其丰富、作用极其重要的学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对经济学的研究，以利于“经世济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但是，研究上面的一些问题，又是极其错综复杂

的系统工程。例如，要研究以人为本，就要研究人的本质以及如何体现并实现人的本质等一系列的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说，“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要研究“社会联系”，研究“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研究“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我一直认为，经济学要加强对人的研究，要研究以人为本的问题。2004年我在一篇文章中又提出：研究以人为本，就要强调：“要使人同大自然、人与人之间，各方面协调发展，体现真、善、美的统一”；“研究如何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的才能”；“不仅使人的物质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精神生活要更加充实，从而使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发展和提升”；“使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和谐、协调，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个性’”。要研究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各方面之间的关系，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还应该看到：经济学是一门现实性、应用性很强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既要看到“看不见的手”，又要看到“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应该研究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发展、变化，研究发展、变化过程中，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而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是经常变化的，“看不见的手”在变化，“看得

见的手”也应随时变化。可见,经济学必须进行的对策性研究,就更加错综复杂,需要经常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科学的对策。这就需要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

以上情况说明:经济学是现实性很强的、极其重要的学科,又是内容极其广泛、极其丰富的学科,经济学对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决不能闭门造车,采取简单的方法,而必须深入实际,并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像曾国安同志所强调的“应该秉持多元化的基本原则”。但当前有些人却强调经济学应该“数学化”,强调经济学研究的单一化,这些说法是很片面的。我们在下面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 二、经济学应该运用数学分析方法,但不能“数学化”

我一直认为,经济学应该运用数学分析的方法,加强对一些经济问题的研究。20年前,我们谈到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就指出:“正确地运用数学方法,对大量有关消费问题的数据,进行科学的加工分析,这对于更好地把握再生产过程消费关系运动发展的规律性……是十分必要的。”诚然,数学分析方法不能成为消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后在谈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还多次强调:“必须加强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必须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但必须反对数学游戏)”。“我一直认为,经济学可以而且应该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以便更好地阐明相关问题的规定性,揭示其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事实上,过去不少著名经济学家,都科学地运用过数学分析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运用过数学公式来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使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紧密结合。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的《经济表》,也运用了数学方式来分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内在联系,这些例子很多。至于20世纪下半叶以后,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的就更多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者成功地运用了数学分析方法,这里就不多说了。

但是,经济学决不能“数学化”,决不能用数学方法“化”掉这门极其重要的社会科学。马克思虽然运用过数学分析的方法(如前所述),但主要是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样就能“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事实上,过去很多著名经济学家,还批评过一些人滥用数学分析的偏向。恩格斯早就批判过所谓“纯数学”的偏向:“所谓纯数学……在分析中所运用

的方式和方法就显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了……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在推到极端时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来的,尽管不是自觉地借来的,所以它不能从它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而只能从现实来说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也反对滥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经济学的问题,提出:“如果认为,通过使用数学来解决这一门科学上的问题,就会使这一门科学的研究弄得更正确或使这一门科学的研究有更可靠的指导,那是没有根据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里昂惕夫首创投入产出分析法,运用了大量的数学公式,但他也反对滥用数学的倾向,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反感的现象”,“这样做实在也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对事务的阐明还有点不诚实”<sup>①</sup>。200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在回答美国《挑战》杂志记者的采访时说:“现在也不认为单纯的数量分析可以取得好的结果,我曾想需要一些哲学基础”<sup>②</sup>。像这种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但是,我国近年来经济学“数学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有的写文章进行宣传,有的还编写专著,有的在专著中,“绪论”的标题,就是“数学化: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提出:“数学化促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就是经济学新老范式的转换过程,是中国经济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我们应该努力倡导经济学的数学化,用以改变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就是要在改造传统经济学上下功夫”<sup>③</sup>(这些说法是很片面的,我们在下面还要另行评论)。有的还采取实际行动,大搞数学推导,大搞数字游戏,满纸公式、模型。本来是简单的问题,却故意用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故弄玄虚,以致出现有些同志说的“玄学”。有的人以是否有数学公式、数学模型来定经济学研究的质量,有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以是否“数学化”来定稿件的取舍。这就说明,经济学“数学化”已经形成不良倾向,甚至已经出现不良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又是研究经济、社会不断运行、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人与大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各方面之间和谐协调、共同发展的科学,各种关系极其错综复杂,而且经常变化,虽然不能说“变化莫测”,但至少可以说是“变化难测”。需要采取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才能揭示它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决不是单纯用数学分析方法所能解决的。

我以前在一篇文章中早就认为:“经济学理论是

对经济关系的深层次作深入的探索,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各种因素以及外部因素的相互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揭示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向和全过程,从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要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并从文化的高度来观察引导、处理这些关系,从而端正其发展方向,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层次和质量。”提出,应该研究: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的关系,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生产力与消费力的关系(特别是物质消费力与精神消费力的关系),立足本国与放眼世界的关系。<sup>⑭</sup>要深入研究和正确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深入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探索,单凭几个数学公式能合理解决问题吗?例如,经济学要研究人,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研究人与各方面的关系,但人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⑮</sup>,而每个人的价值观、性格、爱好、专长等是各不相同的。要研究“人的自由发展”,研究“联合体”内外各种关系,而且是经常变化的关系,能用数学公式完全解决吗?又例如,经济学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这些关系又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从我国当前情况来说,经济学就应研究: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要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就要研究“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问题。研究这些极其错综复杂的而又经常变化的关系,单纯用数学方法,能合理解决吗?“五个统筹”,数学方法能“筹”得了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单纯用数学方法能“和谐”得好吗?经济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社会不等于实验室;经济活动太复杂了,不确定因素太多了,经济发展是复杂的有机体,很多情况不可能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经济学的研究如果简单地搞“数学化”,就会把这一门内容极其丰富而又极其重要的学科“化”掉,这是很不应该的,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经济学的“现代化”,主要应该表现在研究内容的现代化,表现在理论观点的现代化,能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提出重要的理论观点,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经济学的“现代化”,决不是用“数学化”形式就解决“现代化”的问题,那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把“数学化”等同于经济学的“现代化”,到处套用公式,搞些脱离实际的假定,变为自欺欺人的幌子,故弄玄虚,这能使经济学“现代化”吗?事实上,我国经济学早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不用等着“数学化”来“化”它。多年来,千千万万的经济理论

工作者,并没有搞“数学化”,已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今后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加强研究(这问题我们在下面还要谈到),但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在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方面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那反而会把经济学引向邪路!

### 三、经济学还应该运用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除了上面说的合理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外,还必须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而且要以定性分析为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实际问题进行定性分析。采取定量分析时,也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基础,不能舍本求末,更不能滥用数学公式,搞数字游戏。应该像马克思所说的:必须运用“抽象力”,也应该像马克思自己谈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说的:“我的见解……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sup>⑯</sup>。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到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sup>⑰</sup>。我们研究经济学,除了应该研究“经济状况”外,还需要研究“经济史”,需要多多进行“诚实探讨”,在学术上开拓创新。

还要运用其他一些研究方法。例如,既要运用演绎法,又要运用归纳法。演绎法离不开归纳法,演绎法的大前提,需要归纳法来提供;归纳法也离不开演绎法,通过各种具体分析,才能看出归纳出来的结论的可靠性。

又例如,既要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又要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以经济研究而言,既要分析经济现象是什么,又要论证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我认为,经济研究更要强调实证分析的方法。前几年,我在谈到消费力经济学研究方法时,强调指出:“要着重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要深入实际,对客观经济过程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并运用现代技术和现代信息手段,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系统分析影响消费力的各种因素的发展变化,分析消费力的发展变化对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消费质量的影响,分析消费力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及其相互影响,分析消费力诸因素的变化对人的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等等。……从而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提出科学的对策”<sup>⑱</sup>。消费力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如此,其他经济学的研究也应该着重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又例如,既要运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又要运用比较的方法。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可能都很全面,很完整,有些材料可能只从某一侧面反映某种问题,有些材料可能比较粗糙。这就需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得出的结

论才比较可靠。与此同时,还要进行比较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不同时间、地点和不同条件下,出现的情况、问题,大不一样。我们要在实际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分析、比较,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科学的结论。有些问题,不仅要针对国内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之间的具体情况进行比较,还可与国外进行比较。这些方法,对经济学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还要运用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这里不一一说明了。总之,经济学研究方法要多元化,决不能限于一种方法,决不能“数学化”。

#### 四、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落后”、“重建”和今后创新的问题

近年来,有些同志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不但不表示乐观,而且表示悲观。甚至认为:20世纪经济学已出现“危急”,“令人担忧”。有的提出要“重建中国经济学”,有的开研讨会,主题就是:“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有的甚至对我国过去的经济学全盘否定,要脱胎换骨地进行“改造”。如说什么:“中国经济学从来都是‘舶来品’,从客观条件来说,中国至今尚未形成能够孕育和产生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土壤。”并提出要“用数学的思维方式、论证方式和语言形式,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sup>⑩</sup>这些说法是极其片面,极不应该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不断前进,不仅加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开拓了经济学领域一些新学科,不少学者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卓有成效。当然还应该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开拓创新,继续前进。但并没有出现“危急”,不必“悲观”,不必“担忧”,也不必“重建”,更不要“进行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至于说“中国至今尚未形成能够孕育和产生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土壤”,这就不仅是对经济学这门极其重要的学科的全盘否定,对多年来千千万万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辛勤劳动的全盘否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成效显著的否定。因此,那些说法是很错误的,是不值一驳的。

这里还有个问题值得研究:前面已经说到,曾国安同志认为经济学研究方法要多元化,不能只用数学方法,这些都很正确;但又从“经济发展条件”、“信息条件”、“教育条件”、“研究条件”、“研究环境”、“经济学知识(思想)的积累”、“经济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来说明“中国经济的落后”,并认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学要改变落后的局面在短期并不大可能。因为,在这些条件中,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劣势是明显的”<sup>⑪</sup>。这些问题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第一,中国经济学是否很落后,是“整体上”落后,还是某些方面的落后,还需要具体分析。我一直认为,我国经济学的研究,从“整体上”还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如果说不足之处或者说“落后”,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是生产关系。而研究生产关系,又只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很少研究消费关系。只着眼于物,很少着眼于人。”……对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人本身,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sup>⑫</sup>。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落实,对以人为本这些问题的研究,在经济学中也会不断加强,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即令中国经济学在某些方面有些“落后”,要“改变落后的局面”,还是可能的,我们还是有条件的。就以曾国安同志提出的“经济学的发展所依赖的条件”来说,我们和发达国家比,并不都处于“劣势”。例如,“经济发展条件”,以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我们当然不能和发达国家比,但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实际情况不同,甚至各有特色。我们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就是很好的“条件”。如果卓有成效,那就是最大的创新。我们当前研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经济问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经济问题,不就很好吗?刻苦钻研,持之以恒,难道不会“出现思想领先的经济思想家或经济学家”吗?如果“只要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我们要赶上美、日、英等发达国家,至少还需50年,难道我们在这50年内就不能培养出“思想领先的经济思想家或经济学家”吗?又例如,以“信息条件”而言,我们主要是研究我国的经济理论与实际,主要取决于国内的信息,这除了依靠国家有关部门提供信息外,还要依靠经济学研究者自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取得信息和“相关数据”,这和发达国家又有什么不同,又怎么处于“劣势”呢?以“教育条件”而言,我们的教育比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应迎头赶上;但这里讲的是经济学研究,讲的是培养经济学家,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接受教育的人”的多少。事实上,现在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早已具有较高的学历,不需要一般的还要“接受教育的人”,不再用考虑“学历”问题了,这些情况,也不用和发达国家对比了。至于提出的“研究条件”、“研究环境”、“经济学知识(思想)的积累”等条件,不仅各国的情况大不相同,各个研究单位、研究人员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必机械对比。有些情况,虽然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但不一定影响经济学研究质量,导致经济学的“落后”。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更是如此,我们研究的方法,各人不同,更不必和发达国家对比,得出“落后”的结论。

总之,我们经济学的研究,并不很“落后”,某些方面还存在“劣势”,也是可以迎头赶上的。

至于今后创新的问题,我认为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学既然是内容极其丰富的学科,要掌握这门学科,并开拓创新,就不是一日之功。必须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勤于思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sup>⑫</sup>。通过勤奋探索,摘取“最美的花朵”。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序言中所说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sup>⑬</sup>。我们研究经济学,就不要只想走捷径,不要有去找“平坦大道”,要有扎实的理论思维和实证基础,要有“不畏劳苦沿着山路攀登”的精神,争取“达到光辉的顶点”。应该看到:古今中外一些学术名著,都是这些学者“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晶。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哥白尼写《天体运行论》,花了37年;达尔文写《物种起源》,花了28年;我国古代,司马迁写《史记》,花了18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花了19年。这种例子很多,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更不要赶时髦,追“商机”,粗制滥造,欺世盗名,要树立优良的学风。

第二,要深入实际,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提升为理论。特别是我国当前,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我们就应深入实际,系统地进行一些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表,由表及里,从而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得出新的结论,并从实践中进行检验。正如恩格斯谈到理论自然科学时所说的:“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sup>⑭</sup>。经济学是研究实际经济问题的,更应如此。只有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探索,再回到实践中去,这样的研究,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现实意义。

第三,经济理论工作者还应经常与实际经济部门和实际工作者开展合作,共同进行一些实际调整,共同研究一些实际问题,还可联合开一些研讨会,交流情况和经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甚至还可通过交流,共同提出一些对策。这些研究,更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对繁荣经济科学也是很有作用的。

第四,经济学的研究,要勇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不断开拓创新。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sup>⑮</sup>。特别是我国当前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一些值得探索的新领域、新问题。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些新领域,抓住新出现的问题,着力进行研

究。还应该看到,当代科学研究一个重要趋势,是相关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利用相关学科的有关知识,来研究相关的问题。经济学牵涉的面很广,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很多,更需要适当吸收相关学科的某些理论和方法,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中与当前经济学相关的内容,综合进行研究,有的问题,还可合作进行具体研究,以丰富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例如,经济文化一体化是当代社会发展一大趋势。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渗透文化内涵,牵涉文化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就应以文化为契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丰富文化内涵,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这对开拓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丰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很有作用。这就说明,科学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经济学的开拓创新也是很重要的。

#### 注释:

<sup>⑫</sup>曾国安:《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问题的思考》,载《经济评论》,2005(2)。

<sup>⑬</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18、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sup>⑭</sup>尹世杰:《再论当代经济学应加强对人的研究》,载《经济学动态》,2004(7)。

尹世杰 主编:《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26、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尹世杰:《从知识经济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载《经济学家》,1999(2)。

尹世杰:《经世济民以人为本》,载《光明日报》,2004-02-10。

<sup>⑮</sup>⑬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1卷,8、11、37、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sup>⑯</sup>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569、462、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sup>⑰</sup>K 里昂惕夫:《经济学论文集——理论、事实与政策》,中文版,25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sup>⑱</sup>陈源、宫娅丽、周绍珩:《三位诺贝尔奖得主论经济学现状——访罗伯特·索洛、肯尼思·阿罗和阿玛塔·森》,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5)。

<sup>⑲</sup>⑯程祖瑞:《经济学数学化导论》,1、6、18、16、3、2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sup>⑳</sup>尹世杰:《21世纪的经济学——研究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科学》,载《经济评论》,1996(6)。

<sup>㉑</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sup>㉒</sup>尹世杰:《消费力经济学》,15~16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sup>㉓</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4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长沙 410081)

(责任编辑: S)